

序：这一代的爱情美学

谢有顺

我不想把我们这个时代简单地描绘成一个贫困、冷漠而缺乏诚信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在技术、物质领域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又确实难以掩饰其内在的贫乏本性。一个时代总是将它自己显现在它的精神信仰、制度形式里，最清晰的是，还显现在同时代人的情感里。沿着这条线索，我们很容易就看到一个在技术和物质上不断强大，在情感和心灵上却节节败退的人类。这两者的冲突日益尖锐起来，到现在，只要是一个真正卷入当代社会的人，都会发现，经过商业主义和身体哲学的改造，我们所生活的物质世界和情感世界业已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变化在人类的内心悄悄地进行。今天，事实越来越清楚，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和物质上的进步，首先解放的肯定是人的身体，以及身体欲望活动的边界。这个解放的进程，在文艺复兴时代便开始，到弗洛伊德的理论兴起后，人类更是为自己如何才能获得一个快乐的身体找到了实践上的依据。当爱已成往事，当感官被极度推崇，当性被解释成人类前进的一切动力，快乐神话便开始在人们的生活中悄悄登场，至此，什么力量也无法再压制人类要求感官快乐的强烈呼喊了。为了回应这种呼

喊，人类只好不断地将欲望合法化，不断地修正自己情感的逻辑，不断地放低道德要求，并说，这些都是现代人之所以成为现代人的一个基本条件。

现代已经成为解放的代名词。

多数人說，还需要更大的解放。他们认为，缠绕在人身上的禁锢还是太多了，它大大地限制了人性的正常发展，要想办法将它们拆除。出于这种解放的愿望，西方发生了性解放这样的身体革命，青年人都试图用一种放纵欲望的方式来推翻加在自己身上的强制力量，以求获得理想中的自由，没想到，最终走向的却是深深的厌倦和绝望。我在不久前读过一本书，叫《从嬉皮到雅皮——昔日性革命亲历者自述》，它是我所读到的有关西方性革命的著作中，最真实感人的一本。我特别注意到，书里有一张两个男女裸体相拥的照片，从他们的眼神中，我分明听见了心灵破碎的声音。那份漠然，那份迷茫，那份内心的寒冷，似乎在告诉我们，人生的道路已经陷落，接下去该何去何从呢？他们的眼前一片寂静，没有声音起来应答，这让我想起卡夫卡的小说所昭示的——有天堂，但是没有道路。

这是两个美国人。当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狂飙突进的性革命尘埃落定之后，他们作为新一代，内心充满了困惑。狂欢的激情正在消逝，以性为内容的享乐主义也渐渐地变得乏味，新的问题出现了：由于道德的松弛和性的放纵，艾滋病正在青年男女中蔓延。人们再也不能随意乱交，随意交换性伴侣了。于是，一些新的享受方式开始风行于世：捆绑，束缚，施虐，受虐，身体穿刺，等等。他们想用这

种冒险的方式，来填补内心日益增长的空虚和绝望，结果换来的却是更深的恐惧。保守主义者希望在全社会建立新的道德标准，一些人则开始过一种远离工业文明的隐居生活，希望以此来找回人性的纯朴和本真，《纽约时报》也向大家呼吁：“让我们回到过去的岁月吧！家庭、伦理、道德——多么温馨与和谐。”而就在几十年前，有人曾这样警告他们：“谁欲火中烧却不敢付诸行动，谁就会酿下可怕的灾祸。”如今，青年一代大胆地将欲望付诸行动之后，同样酿下了可怕的灾祸，他们并没有在混乱的激情中找到他们需要的幸福。怎么办呢？只好继续寻找。有意思的是，人类绕了一圈之后，仿佛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他们把理想砸碎之后，到头来还要想方设法将那些碎片重新缝合起来。经过了性革命的实践，人们猛然发觉，弗洛伊德的理论并不完全正确。弗洛伊德将一切人生问题都归结于性，可是，人类拆除了一切性禁忌之后，精神问题并没有获得圆满的解决。看来，想靠任何激进的方式来改变我们生活的质量都是无济于事的。

有一句话说，人心其实是非常传统的。

社会在进步，但情感、爱、友谊、梦想等事物往往有它自己恒定的结构，有它自己特有的展开方式，适应它，就能幸福，践踏它，就会带来灾难。这些西方社会曾经面临的问题，如今已经来到我们面前，你只要稍稍四顾，就会看到，由于商业主义兴盛所带来的价值混乱，当代中国到处都弥漫着浓重的爱情悲观主义和失范的性爱自由主义，即便是在那些貌似平静的现实碎片背后，情欲的风暴也正

在肆无忌惮地袭击每个人的内心，并渴望冲破最后的障碍，如同渴望一次放纵。这点，令许多道德学家们感到恐惧。我不愿意轻易地对此作出道德审判，因为这对于一个人了解它的时代本质并无助益，可谁也无法否认，爱情作为支持我们向往诗意生活的基本信念，作为最后一个缓解生存焦虑的孤独城堡，其赖以存在的基础正受到致命的瓦解，或者说，神圣的爱情正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些残缺的情感。

残缺的情感——这一说法最初出于北村的小说《水土不服》，它是我所读到的对现代人爱情生活最准确的描述。一直以来，我都渴望能找到一种方式，以真正了解我们这个时代内部的爱情细节，了解现代人内心中每一次的精神波动，结果发现，在众多的方式中，文学是最有效的一种。作为一种高贵的精神事务，写作虽说源于虚构，但它在抵达人类内在的真实上，有着难以言传的锐利和深邃。这就是我主编这套“爱情档案”丛书的本意：我希望从中国当代的青年作家中，找出几位真正深入爱情内部的人，把他们在其中的挣扎、陷落或者反抗、觉醒，用个人的方式书写出来，以至对一代人在情爱体验上的深刻变化有一种全新的理解。我的确觉得，爱情这一永恒的文学母题，是最富有存在感的，也是了解当代中国的一个很好的解码口，它可以使一切乐观或悲观的精神细节无处藏身，而“档案”一词，就是希望它能保存这样的细节，使之成为时代记忆的文学标本。

我喜欢有记忆的作家，正如我喜欢有梦想的作

家，有了记忆和梦想，一个作家的写作才能真实地在此时此刻的现实中展开。我的意思是说，假如一个作家对他现在置身其中的日常生活本身没有切肤之痛，那么，他的任何记忆和梦想都是可疑的。或者说，一个作家如果对现在没有愤怒，那么他对过去肯定没有记忆，对未来也不会有恰当的形象。我不喜欢看到一个作家凌空蹈虚，相反，那些对当下生活敏感、并乐于与卑微的日常细节结盟的作家更让人尊敬，因为他们至少是诚实的，谦卑的。这并非容易的事情。许多的时候，作家都愿意走一条虚化日常生活、漠视现实冲突的写作道路，以便换来内心的轻松，而少受生活进入写作时那种精神折磨，所以，与此时此刻的现实比起来，他们更愿意关心远方的理想，更愿意去占领一个虚拟的道德高地，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崇高的作品，正所谓“生活在别处”，写作在远方。于是，大部分时间，作家们都在写一种理想，一种往上升的东西，一种抽象的事物，或者一种语言的自我缠绕，而很少看见他在生存的地面上前进时所留下的痕迹。今天，我乐于看见写作从一种不正常的和当下精神现实、内心生活相疏离的状态，回到普通的人群中。我相信，当写作从一种天上的状态落下来，回到具体的现实、具体的人性、具体的语言、具体的事物和具体的美的时候，尘封已久的当代生活将向作家真正敞开。

安德列·纪德在《人间粮食》中感慨万千地说：“你永远也无法理解，为了让自己对生活发生兴趣，我们付出了多大的努力。”阅读“爱情档案”

丛书第一辑四位作者——北村、东西、刁斗、李洱的小说，我心里经常会有一个突出的感觉：这是一些在生活面前努力过的作家。他们对现实生存的精微洞察，对人性复杂性的独特发现，对人的悲剧本质的警觉，以及异乎寻常的叙述耐心，都见证出他们是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我毫不掩饰对他们作品的喜欢，特别是将他们都放在爱情这一母题下集体亮相时，必须承认，他们准确地摸到了爱情在这个时代里跳动的心脏。为什么爱？如何将爱进行下去？爱情的障碍在哪里？是哪一些黑暗的力量在粉碎爱情？北村等人成功地将这些问题带到我们面前，并让我们看到：一个缺乏爱情的时代是没有指望的，令人不安的；在爱情的意义得到确立以前，人存在的意义不可能提前实现。是爱，为这个世界带来了希望；是爱，为今天的人类挽回了尊严。我想起加缪在《鼠疫》一书中所宣称的：“这没有爱情的世界就好像是个没有生命的世界，但总会有这么一个时刻，人们将对监狱、工作、勇气之类的东西感到厌倦，而去寻找当年的伊人，昔日的柔情。”

可以说，“爱情档案”丛书的编辑和出版，正是这种“寻找”的结果。我的本意是想找一些真正有力量的爱情故事，用以反抗把爱情日益物质化、情欲化和粗鄙化的潮流，使爱情恢复到它原有的空间里被书写，重新找回它的神圣光芒，进而慰藉这个时代众多失爱的心灵。然而，读完《周渔的喊叫》、《不要问我》、《为之颤抖》、《破镜而出》这四本小说集之后，情况正好相反，我不但没有找到爱情小说该有的甜蜜和慰藉，内心反而感到悲凉，因为这

些爱情话语无一不是与悲剧相连。我们就置身于这样一个破败而绝望的爱情现场吗？在阅读过程中，我常常这样问自己。然而，爱情的失败和消失不正是我们每天所面对的事实真相吗？当这个时代的精神问题已经严重到了需要我们为之垂泪的地步的时候，一个敏感的、有存在感的作家，他笔下的文字表情除了呈现悲剧之外，还能做些什么？乐观主义的时代过去了，人类必须学会在悲剧中生活，爱情也不能例外。海德格尔说，我们时代的贫乏本质，就在于痛苦、爱情与死亡的本性没有显露。在这里，爱情和痛苦、死亡联系在了一起，似乎已无路可逃了，只等残酷的现实来宣判。这并不奇怪，也许只有爱情的本性彻底显露出来，我们才能看到时代内部的真实。

也许是一种巧合，“爱情档案”丛书中的四位作家，正好为我们提供了四种不同的认识爱情的途径。北村是想说，爱情在着，但它是不可可能的，“那种看起来非常伟大的爱情是经不起轻轻一碰的”（《周渔的喊叫》），它的真正障碍是，每个人里面都有原罪，而这种罪的权势使人失去爱的能力和信心；在罪得到赦免以前，人不可能享受真正的爱情，有的，只不过是一些残缺的情感而已——这就是北村在他的小说《水土不服》中所着意探查的。包括《周渔的喊叫》和《强暴》，北村出示的都是某种爱情的虚幻性和局限性，以及它的绝望品质。这几篇小说，几乎都从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开始，但是，很快就被瓦解，粉碎，以至走向崩溃。起初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后来这些细节就扩大成为灵魂中

的阴影，将爱情彻底带入黑暗之中。理想的爱情——“你知道什么是爱情吗？爱情就是天堂，我可以死在他怀里而一点都不惊慌，不害怕也不绝望，这就是爱情。”（《水土不服》）——在现实与欲望面前可谓不堪一击，正如那个叫小芳的女人所说，“肉跟肉碰了一下，如此而已”（《水土不服》）。在这种境遇下，一个追求真爱、渴望圣洁、向往完美的人（比如《水土不服》中的诗人康生），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所以，康生先后自杀了三次，并在遗书中说：“我是迫于无奈才这样做的，不这样做不行，活不下去。如果心死，可以活着，但心死不了。我不在了，我的尸体还在，那是一个带罪之身，没人赦免我，活不下去，真的。我知道要烧成灰，这样最好，在最后的盼望就这个，因为灰是最后的东西，没有比灰更接近于消失了，没有比灰更灰的了。即使这样，你也要在我的骨灰盒上写上：这是一把有罪的灰。”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最终走到如此结局，读之，实在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北村确实将理想中的爱情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推到了极致，使我们得以有机会在本质和根源上，对爱情作一种清理和终极追问。其所达到的深度，以及切入角度的新颖和尖锐，在中国当代小说中都是罕见的。相比之下，东西的小说蕴藏着轻松、幽默和游戏的品质，但它一落实到爱情命题的处理上，导向的却是错位和荒谬感，令人忍俊不禁的同时，常给人带来浪漫、温情和梦想被撕裂的不适和痛楚。东西自己也说：“尽管我的小说处处充满了男欢女爱，但是我却很少单纯地从爱情这个角度来打量我的小说。”

那种痴迷的爱，从头到尾的爱，那种看上去很浪漫，而其实一点也不现实的爱，我的小说里几乎没有。我笔下的爱情没有那么多童话，都是一些不现实、病态的、和性相关的爱情。而且还不仅仅是爱情，爱情在我的小说里就像一节拖车，它会拖出许多另外的东西。”（《不要问我·后记》）最后，东西还告诫我们说：

“浪漫只不过是我們的一种幻想，现实才是我们的终身伴侣。”而事实上，现实也不过是爱情的一个借口（《过了今年再说》），一种荒唐的游戏（《痛苦比赛》），一次匆忙的肉体交易（《关于钞票的几种用法》），它所显示的更多的是存在的荒谬感。特别是《不要问我》这个中篇，写出了人的存在中极其内在的悲剧性，是东西继《没有语言的生活》之后最好的小说。主人公卫国是一个大学副教授，酒后冒犯了一个女学生，为了免于尊严上的折磨，他从西安南下，到另一个城市谋职。没想到，他的皮箱在火车上遗失，随之消失的是他的全部家当和所有证件。他成了一个无法证明自己是谁的人。麻烦接踵而来：他无法谋职，甚至无法在爱情上有更多的进展，总是处在别人的救济、同情、怀疑和嘲笑之中。原来是为了逃避尊严上的折磨而来到异地，没想到，最终却陷入了更深的折磨之中——生存的无能、无力和无奈可谓昭然若揭。中间当然也伴随着具有荒谬感的快乐，甚至还多次出现类似于爱情的慰藉，但挫败感仍然无法阻止地一次次降临。那个叫卫国的人不由自主地陷入到了这样的生存悲剧之中：你活着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你

必须借助户口、身份证、学历证书等来证明你活着是合法的；也就是说，你只有在得到体制和证件的承认之后，你的活着才能像人一样正常地进行下去，你的爱情才能正式开始。

生活是这样的无奈和沉重，我分明听见了《不要问我》中那个叫卫国的人在心里如此哀叹。每个人都正在生活面前付出代价，而尊严的实现却遥遥无期。所以，东西在小说的结尾所设置的那个比赛喝酒的细节，虽说有黑色幽默的效果，但我依旧从中读出了无言的悲怆，不由得让我想起福克纳在《我弥留之际》中的名言：他们在苦熬！——苦熬中的人，如果没有爱的慰藉，绝望就应运而生。这个时候，惟一可靠而真实的幸福，似乎只剩下身体本身了。刁斗的小说，探查的就是这个问题：身体，或者说单纯的性满足，究竟在爱情和婚姻生活中占据一个什么位置？我们是像过去那样，以某种高尚的理由忽视身体的正常需要，还是把身体需要的合法性纳入到感情之中来考虑？肉体与爱情之间究竟有什么秘密的联系？刁斗显然是一个尊重肉体的作家，或者说，他承认人的存在受肉体的限制，而不愿在肉体之外制造爱情幻觉，更不愿意轻率地对肉体参与爱情一事作出道德审判。许多的时候，肉体恰恰就是爱情的大限。他的《作为一种艺术的谋杀》、《为之颤抖》等小说，都在摸索男女之间新的隙缝和新的结合方式，确实为我们敞开了人性的另一面，并对情爱关系在现代社会的变化有深刻的发现。比起刁斗的直接和执著，李洱却是更多地把性爱命题处理成游戏和暗示。大背景当然还是欲望

汹涌的时代，但李洱所着意表达的似乎是知识分子如何利用智慧作面具，对爱情进行意淫和想象补偿。《破镜而出》、《导师死了》、《二马路上的天使》、《缝隙》等小说，都写到了爱情如何在一些人之间兴高采烈地开始，而最终却都应了甲克虫乐队的一句歌词，爱情有一夜之间就消失的恶习。只剩下一些鸡零狗碎的情感游戏，在间或挑起某些人心底的激情，这不禁让人叹息：知识看来并不能帮助爱情，反而容易把人变得冷漠，渐渐失去爱的能力。

失爱的生活开始了。那些由良心的重担、罪、存在的荒谬、性的张扬、知识的面具、爱的能力的匮乏所共同构成的破坏力量，把通常意义上的爱情分解得面目全非。谁能想象，在北村、东西、刁斗、李洱这四位优秀作家笔下，美好的爱情无一例外地与某种黑暗的经验相连？过去我们所固守的一切似乎都溃散了。然而，失去了爱情的人类，还能在哪里互相取暖呢？我感到迷惘。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我才会强烈地想起，人是需要爱和被爱的特殊动物，无论你多么反叛，失意和受挫时，第一需要的肯定是爱的慰藉。可是，从什么时候起，人类丧失了追求爱情的勇气？又是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中的多数人都成了欲望的俘虏？古人是说，“爱情如死之坚强……爱情，众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雅歌》八章七节）而现在呢，只要一次邂逅，一个眼神，一种装扮，甚至一些微少的钱，就能把爱情的防线彻底击溃，到最后，爱情成了性，做爱也就成了做性。

但性放纵远非爱情惟一的敌人。真正的敌人是，这个世界普遍重物质而轻感情。即便是美好的性，在许多人看来，也不过是身体中某种情欲物质的释放而已。面对广阔、无限而无情的物质世界，性情和爱正在丧失自己的温度。请看下面这段对白：

甲：阿明，那个女孩子时常这样地望着我，你说她是否对我有意思呢？

乙：你又怎知她对你有意思？

甲：她以水汪汪的眼睛凝望着我。

乙：或许她只不过是瞳孔放大罢了。难道这是有意思的表现吗？至于水汪汪的眼睛，可能是她患了伤风。而且，这里很暗，她的瞳孔当然放大，又或者是因为她本来就眼睛发青光，于是就这样地望着你。

有一个叫梁燕城的哲学博士解释道：现代人就是这样，本来一个很浪漫的情怀，在自然方法解释之下完全消灭。他们把一切简单归纳为自然和物质的解释，使人丧失了人性与心灵的世界。人性本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创造和自由，渴望找到真、善、美，可惜现代人将一切归于无性情的物质自然，所以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变得空虚迷惘，只能创造各种神话来补偿心灵的空虚。因此，我愈发感觉到，重铸爱情信念、回到有情世界是现代人精神生活中刻不容缓的大事。从“爱情档案”丛书的文字深处，我们不难听到这样的呼声。情爱游戏和感官快乐，也会有让人厌倦的一天，现在，让我们从这里开始爱情之旅的艰难跋涉，让我们一同来书写新的

“爱情档案”，一同向内心那个温暖的圣地进发。

我一直记得雨果在一篇叫《石头下面的一颗心》的短文中所说的话：“如果你是石头，便应当做磁石；如果你是植物，便应当做含羞草；如果你是人，便应当做意中人。”——如果这套丛书让你产生了类似的想法，爱情的光芒大约马上要照到你的跟前了，请不要逃避，靠近它。

2001 年 3 月

关于页码

001 /	初 吻
021 /	证 据
039 /	组合方式
057 /	作为一种艺术的谋杀
116 /	为之颤抖
168 /	孪 生
257 /	后 记

初吻

我最早渴望与女人接吻，并且这样想时，身体会出现奇妙的反应，是十四岁。若往前推，在我父辈那一代里，到了十四岁这个年龄，就在家长主持下吃定亲饭交换定亲礼以至于干脆结婚入洞房的，已大有人在；若往后推，在我儿子辈这一代里，到了十四岁这个年龄，男孩女孩就无所顾忌地勾肩搭臂卿卿我我甚至索性同居的，也绝不罕见。据我所知，只有我们这代人，在那个尚未成年的年龄段里，好像生理心理都停止了发育，或者说，由于我们的生命被动地经历了一次破坏性的催眠实验，所以我们发育出来的青春期，差不多只相当于毫无意义的一截空白。

那时候，我既没听说过“接吻”这个词，也没看见过别人接吻，我和我的同学都把接吻叫做“亲嘴”。大家开玩笑时，有时会既猥亵又鄙夷地说起谁爸像妈亲嘴了，而哪个同学若被人议论了爸妈之间有亲嘴的行为，就如同被人掘了祖坟，要蹦脚跳高地予以反击；如果铁证如山反击失败，便会羞愧难当，好像其爸妈犯下的罪过，只略逊于那些在批斗游街时脖子上被挂了破鞋的风流男女。由此可见，接吻是件可耻的事情，尤其在我这种好孩子眼里，它似乎比学校天天批判的林彪孔老二还罪大恶极。

那时我确实是个人人公认的好孩子。在家的情况我就不多说了，不光从不在社会上打架，还能帮爸妈买菜做饭收拾房间，他们都夸我懂事省心体谅

人。我的好，更主要地表现在学校里。我不仅是连年的三好学生（批判林彪以前叫五好战士），不仅是我们班（批判林彪以前叫排）的班长，还是全年级（批判林彪以前叫连）的“预备团支部书记”。在这里，我得解释一下什么叫“预备团支部书记”。那个时候，学校对学生入团的年龄限制十分严格，不到十五的十足岁数，就别想迈进组织大门。这样，在我们这个十四岁年龄段的年级里，三四百人无一团员。但共青团组织是中学里一个重要的领导部门，在没有团员的年级里它也需要发挥作用，于是，在形式上没有入团的我却提前在思想上成了团员，当上了我们年级的“预备团支部书记”。作为“预备团支部书记”，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像高年级团干部一样出入学校团委的办公室，我能够堂而皇之地成为学校团员代表大会上的正式代表，而在我所在年级开展的各项活动中，我更是一个当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可就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在我这个好孩子的脑袋里，却萌生出了与女人接吻的下流念头，并且在这念头出现时，身体还有可怕的反应，这给我带来了多么巨大的痛苦与焦虑不言而喻。我十四岁的内心，简直成了一座两军对垒的浴血战场：一边是通行道德规约对一个好孩子的蒙昧抑制；另一边是日趋成熟的生理心理对两性体验的强烈欲求。

也许有细心的读者已注意到了，我在说到我要与之接吻的对象时，说的是“女人”，而不是“女生”。照理说，作为一个懵懂少年，我能接触到的异性大多是同学，若我真要与谁发展出一种特殊的关

系，那也只能是“女生”而非“女人”。况且，后来想想，当我在学校里作为“预备团支部书记”而德智体全面发展时，也的确有几个女同学对我青睐有加，她们的身体已有曲线出现，她们的眼睛已有水波荡漾，我完全有理由有条件也有可能与她们情来意往，耳鬓厮磨。可我这人，从十四岁那个情窦初开的时候起，直到现在，儿子都情窦开过好几回了，我喜欢的异性，却始终是“女人”而非“女生”。我认为，“女生”只是年龄序段，只有“女人”才是性别符号。尽管我当时没有现在的理性认识，但凭直觉我也能做出判断选择，所以，我对身边不论多么漂亮的女生都视而不见，而只让一个女人在我的眼里心里扎下了根。那个女人，她名叫秦怡。

有一个很出名的电影演员名叫秦怡。但我说的这个秦怡，不是那个秦怡，我最早听说那个电影演员秦怡，还是我爱恋的这个秦怡告诉我的。我说的这个秦怡，当年是我爸爸的部下，比我大五岁，也就是说，我十四时她年方十九。

若用我现在的眼光来看异性，十九岁无疑也是女生，即使她参加工作了，和我爸爸那样的大人混在一起了，也不算女人。可在我那十四岁少年人的眼里心里，十九岁的秦怡已经是个标准的女人了，她的一颦一笑，行走坐卧，无处不充满成熟女人妩媚的风韵，能成为女人性别的最好注脚。几年以后，电影市场上复映了一批挨过批判的老电影，我为我一生中爱上的第一个女人秦怡，看遍了比我妈妈年龄还大的女演员秦怡参演的所有电影。我发现，其实从演员秦怡身上所放射出来的，那才真正叫成熟